高质量发展阶段扩大消费的战略意义和实现路径

王小广　梁雅楠　张晏玮

[摘　要] 消费是市场经济重要的基础。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发展的主要问题突出表现为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要从循环与增长动力变化看扩大消费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稳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扩大消费要着眼于国民经济循环整体，解决关键“堵点”——收入分配瓶颈。根本办法就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促进居民消费倾向回升，使巨大的消费潜力得到有效发挥，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建议实施以深化分配体制改革为主的一揽子扩大消费的方案，从税制结构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功能、做实高端产业链、优化消费环境等入手，在战略上和政策上突出扩大消费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 国民经济循环；消费不足；居民消费倾向；分配端改革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3）10-0037-14

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其重要标志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先发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及许多后发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唯重要途径。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供求两方面支撑，即协同推进供给端高质量发展和需求端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供给质量的高低不仅影响生产环节的效率提升和创新能力的增强，同时也会对消费结构升级产生持续影响，高质量的供给通过提供更多高质量、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促进消费结构升级。需求质量的提高一方面本身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会倒逼供给质量升级，并与供给质量之间形成互相增益的良性互动关系。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发展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其中最突出的问

[作者简介] 王小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梁雅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张晏玮，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题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本文重点从循环与增长动力变化看扩大消费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运用系统循环原理分析导致我国消费严重不足的深层原因，最后提出治本对策。

一、从循环与增长动力变化看未来扩大消费的战略意义

（一）过去低估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消费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消费是目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现为总体消费力的显著增强，国家的富强也是建立在强大的消费需求基础上的。投资与生产都是手段，其重要性在发展的早中期更显著。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消费的地位及能动性将显著提高。过去对消费的认识，主要是基于供需平衡和生产的主导作用这两个方面，这可能符合过去的事实，在政策操作上也比较简便有效，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种传统认识明显存在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从基于供需平衡和生产主导的角度来认识消费，使消费的重要作用长期被低估。从国民经济平衡角度看，消费不具有主导作用，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所谓国民经济总量平衡通常是指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实际上，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指总的最终供给和总的最终需求之间的平衡，这两者在短期内通常是不平衡的。在成熟的经济体中，这种总量平衡相对常见，而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内，总的最终供给与总的最终需求并不是平衡的，通常是“非均衡”的。只要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便认为是总量平衡。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实际都体现“非均衡”特点。导致“非均衡”增长或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的作用。投资通常是一个长期性行为，从需求上讲，它是中间需求；从供给上讲，它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增长。因此，宏观经济管理上讲的需求管理，实际最关注的是对投资行为的干预，而此时消费总是处于被动和次要的地位，政策很少去刺激消费，但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却不得不去抑制消费。

导致消费被低估的另一个原因源自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人们认为生产决定收入与消费，消费是被动变量，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初中期，短缺或供不应求是常态，供给创造需求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铁律，没必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去重视消费。在生产主导的经济及投资主导的经济中，消费不重要，也因此使得消费问题会越积越大，难以解决。特别是在进入到相对高级经济发展阶段时，消费的战略作用凸显，这需要从循环和增长动力变化来确定。从循环功能上讲，随着市场化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作用更为关键。消费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的决定因素，特别是高质量供给体系的建立要依靠强有力的需求支撑。从新发展阶段增长动力转换来讲，消费与投资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投资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优化供给结构上，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靠投资，而促进经济增长则只能靠消费扩张。这是与高速增长时期相比最大不同点。

（二）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上认识消费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作用

循环高效畅通是决定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的基础是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国民经济循环比国民经济平衡重要，且循环包含平衡。国民经济循环既指生产经过分配、流通两环节，到消费，又回到生产，从而形成一个经济大循环系统，也指企业、家庭、政府与国外等四部分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大循环系统。它是一个循环运转的概念，揭示的是各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和反馈机制。

过去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比较注重总量平衡，而较少关注国民经济体系循环。进入新发展阶段，为什么循环会变得更加重要？因为经济体越大，发展水平越高，循环问题会越突出。比如五十岁以上的人常会出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三高”问题，其实就是血液循环疾病。循环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而变得更为重要，如果经济运行的四个重要部门与环节有一个出现了严重“梗阻”，经济运行就会严重失衡，甚至出现如货币流动性不足、严重的需求不足、生产率持续下降等问题。

当前消费不足从供需平衡和循环两个方面严重影响我国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率，并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不断下降。从物质生产层面，我国绝大多数工业产品已进入产业生命周期的后期，即 90% 的工业品已达到了产量峰值，且出现了普遍报酬递减问题。此时的产能过剩不再是周期性的相对过剩，而是绝对过剩。在绝对过剩条件下，常态的供给增长不会带来实际性的经济增长，相反会导致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从而形成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相对而言，国内消费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扩大消费成为调节供需平衡或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决定因素。但由于在高增长时期长期存在投资过度增长及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导致我国消费率过低、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成为供需之间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有效循环的巨大梗阻，出现明显的累积性消费不足问题。根据“木桶效应”，在供给相对稳定且出现绝对的产能过剩时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短板，消费增长率的提高意味着潜在增长率的上升。因此增加消费，既可以明显缓解绝对过剩问题，保持物价稳定，同时随着消费“短板”的拉长，也会遏制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发挥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消费“堵点”的形成。如果主要是由消费能力不足引起的，那么其真正的“堵点”不是消费本身，而必须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循环上去寻找。所以，扩大消费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问题，而是要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内在障碍。

（三）从长期增长动力转换的角度看扩大消费的战略作用

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规律是，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下降，投资的重要性则主要体现在增强创新能力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上。

首先，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已发生历史性变化，由中等收入水平向发达水平升级时，投资主导型经济将转换为消费主导型经济，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投资与消费作为两个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长期经济发展进程看，它们的关系一般都要经历两次大的历史转变。一次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经济增长阶段转变。在现代经济增长之前，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这是低级的消费主导时代。这一阶段基本没有投资，或公共投资和社会投资都极少，经济增长主要靠“基本生存需求”驱动，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且困难重重。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低级的消费主导型经济让位于投资主导型经济，资本积累率也就是投资能力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后的 30 多年高增长主要靠投资，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计划经济时期也是靠投资，消费只是被动适应，且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供给可以创造需求，即消费的上升也是受投资的驱动。1978—2012 年间我国高增长时期，投资年平均拉动 GDP 增长 4.5 个百分点，而消费年平均拉动 GDP 增长 6.2 个百分点，尽管消费对经济增长起了主要贡献，但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投资。而 2003—2012 年这 10 年明显是投资强拉动时期，投资与消费年均分别拉动 GDP 增长 5.6 个和 5.2 个

百分点。当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时，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再次发生重大转变，即经济增长模式重回消费主导型，但却是高水平的消费主导型经济。投资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整体经济发展效率的显著提高，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消费扩张带来的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两个提高”是一种最优组合，投资占比的下降及贡献率降低，主要是因为投资效率—投资产出率的明显提高，即“资本的高能化”。相应地，与投资率下降相伴的是消费率的上升，消费才是体现社会福利水平的总成果，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根本表现形式。

其次，根据投资与消费关系的重大变化规律，我国消费尚有巨大的增长空间，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估计未来30年消费与投资两者不同的增长潜力，主要是根据现代化一般规律——人均GDP达到高水平后经济结构趋同的原理倒推。经济发达水平的投资率一般在20%左右，即以最小的投资规模或一定量最高能的资本创造最大的经济福利（消费率最大化）。1970—2015年间，欧美发达国家各国投资率都趋同于20%左右（见表1），即人均GDP达到6万美元时。人均资本形成总额为1.2万美元左右。按照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分两步走战略部署，我国人均GDP差不多在两个15年间都要翻一番，届时人均GDP按现价差不多也达到6万美元左右，那么，2050年前后，我国人均资本形成总额估计为1.2万美元左右，而人均消费量（指最终消费）则达4.8万美元左右。而2022年我国人均资本形成总额和人均最终消费分别为4.54万和3.60万人

表1　主要发达国家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投资率）

年份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1970	17.84	27.33	20.07	27.11	35.47
1980	18.39	22.97	15.52	24.22	30.12
1985	20.22	19.58	17.18	19.91	28.16
1986	19.48	19.90	16.87	21.13	28.60
1987	19.20	19.95	18.69	21.73	29.79
1988	18.77	20.70	20.07	22.85	31.94
1989	19.10	21.51	20.69	23.66	33.45
1990	18.34	21.63	19.07	23.65	34.38
1991	16.81	21.72	16.95	22.70	34.27
2000	22.57	22.98	18.37	23.12	26.12
2005	22.55	19.06	17.18	23.14	23.46
2010	18.39	19.63	16.36	21.91	19.81
2015	20.47	18.80	18.46	22.77	20.9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年份《国际统计年鉴》。

表2 主要发达国家消费率与我国的比较

	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韩国	中国	中国（国家统计局）
1995	82.3	72.2	76.3	79.3	77.5	77.4	75.8	51.0	59.3
1996	81.6	71.4	77.1	79.8	78.0	77.1	75.6	52.1	60.3
1997	80.8	71.3	76.3	79.1	76.7	77.8	74.0	51.3	59.9
1998	81.0	72.1	76.1	79.8	76.0	78.7	70.7	52.3	60.7
1999	81.1	73.5	76.3	80.8	75.6	79.3	70.3	54.9	62.9
2000	81.3	73.0	75.4	81.1	75.0	78.5	69.5	56.8	63.9
2001	82.7	74.2	74.9	82.1	75.1	78.4	70.2	56.2	62.2
2002	83.5	75.3	74.5	83.1	75.7	78.4	70.7	56.4	61.2
2003	83.5	74.8	75.4	83.4	76.3	79.0	68.9	54.5	58.1
2004	83.2	74.2	74.8	84.1	75.7	78.6	66.3	53.5	55.4
2005	82.8	73.8	74.8	84.0	76.0	78.8	66.6	53.8	54.3
2006	82.6	73.4	73.0	83.3	75.6	78.1	66.7	52.6	52.5
2007	82.9	73.0	71.0	83.0	75.6	77.8	66.6	52.0	50.9
2008	83.5	73.2	71.2	83.5	75.9	78.1	66.1	51.3	50.0
2009	85.5	77.5	76.0	85.7	78.9	81.5	66.6	51.9	50.2
2010	84.6	76.1	73.6	85.0	78.7	80.9	65.3	51.4	49.3
2011	83.9	76.2	72.0	83.9	77.6	80.0	64.7	52.7	50.6
2012	82.8	76.6	72.7	84.1	77.5	79.8	64.7	52.9	51.1
2013	82.0	76.9	72.9	83.9	77.7	79.5	64.2	52.7	51.4
2014	81.6	76.3	72.2	83.5	77.7	79.5	63.8	52.9	52.3
2015	81.5	75.4	72.7	83.9	77.9	79.9	63.6	54.0	53.7
2016	82.1	74.9	73.1	84.4	78.3	79.7	63.7	54.8	55.1
2017	81.8	74.3	72.3	83.8	77.6	79.3	63.6	54.8	55.1
2018	81.5	74.2	72.4	84.0	76.9	79.2	64.1	55.4	55.3
2019	81.5	74.0	73.1	84.2	76.7	78.9	64.7	55.6	55.8
2020	82.0	75.1	74.1	84.1	78.3	79.7	63.7	54.2	54.7
2021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54.1
2022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53.2

资料来源：前8列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我国的数据则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年）和2023年《中国统计摘要》。

民币，折合现价美元为6757美元和5349美元。由此测算，我国资本与消费的年均增长潜力分别为2.3%和7.3%。或者从增长的总空间来讲，未来不到30年，我国消费有6倍的增长空间，而投资仅有1.2倍的增长空间。

总之，无论是从增长动力转换规律与增长潜力看，还是从解决短期经济运行问题看，消费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具有战略性，是未来30年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人民生活品质的“大关键”。

二、当前我国消费不足问题及原因剖析

（一）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表现

1. 消费率明显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的变化可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2003年，其特点是消费率常态化偏低，但持续20多年保持相对稳定。最高的消费率出现在1983年，为67.3%，最低消费率出现在1993年和1994年，两年消费率均为58.5%。这一阶段在经济上的典型特征是轻纺工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这与短缺经济特征

表3 1万美元左右发展中主要国家的消费率与我国的比较

	中国（国家统计局）	巴西	土耳其	墨西哥	俄罗斯	阿根廷	马来西亚
1995	59.3	82.8	78.0	77.0	63.1	76.9	54.4
1996	60.3	82.6	78.8	74.8	64.2	76.5	52.3
1997	59.9	82.0	79.0	74.9	65.1	76.4	50.9
1998	60.7	81.9	78.4	75.2	67.3	76.2	49.5
1999	62.9	82.0	81.4	76.7	62.5	77.8	49.3
2000	63.9	81.0	79.6	77.8	60.0	78.1	49.9
2001	62.2	80.8	79.8	79.4	61.0	77.4	52.3
2002	61.2	79.9	78.2	80.7	62.3	75.8	52.4
2003	58.1	79.0	78.9	81.0	61.6	74.5	53.6
2004	55.4	77.6	78.4	81.0	62.9	74.0	54.9
2005	54.3	78.1	76.1	81.3	64.5	73.3	56.6
2006	52.5	78.8	74.5	80.8	65.3	74.5	57.0
2007	50.9	78.6	74.9	80.9	66.9	74.6	58.9
2008	50.0	78.8	75.0	80.8	69.1	76.6	60.9
2009	50.2	82.2	77.6	81.1	72.0	78.3	62.8
2010	49.3	80.7	78.0	79.7	71.3	78.4	61.8
2011	50.6	80.9	77.2	79.5	72.0	80.4	63.7
2012	51.1	81.9	76.5	78.6	73.5	82.4	65.0
2013	51.4	82.0	75.9	78.8	74.9	83.5	66.4
2014	52.3	83.1	74.6	78.3	75.0	82.9	66.7
2015	53.7	83.7	73.8	77.7	70.4	84.0	67.0
2016	55.1	84.1	74.9	78.4	69.2	85.2	67.3
2017	55.1	84.1	73.7	78.9	70.3	86.1	67.9
2018	55.3	84.3	72.7	79.2	70.8	86.4	69.4
2019	55.8	84.6	73.5	79.4	71.7	82.6	70.8
2020	54.7	83.6	74.4	78.9	70.3	80.7	72.9
2021	54.1						
2022	53.2						

资料来源：我国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年）和2023年《中国统计摘要》，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结合，导致高投资高增长必然带来高消费。这25年的平均消费率为62.7%，与典型发达国家和有代表性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消费率均偏低15个百分点左右。第二阶段是2003—2010年，这一阶段消费率大幅下降，处于严重偏低状态。由于我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高速增长阶段，资本密集型的特征显著地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率，从而导致我国消费率进一步下降。这一阶段最高的消费率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轮周期启动的第二年，即2003年，当年消费率为58.1%，比上一期的最后一年下降3.1个百分点，到2004年再下降2.7个百分点，两年形成断崖式下跌，直到2010年降至历史最低点49.3%。此阶段持续时间达10年，平均消费率为52.2%，比上一期低10.3个百分点，由此导致我国消费率在此阶段比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国家偏低25个百分点左右（根据表2、表3的比较）。第三阶段，也即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消费率开始回升，但爬升极为缓慢，进而成为经济全面转型升级的重大需求障碍。迈过中等收入门槛后，特别是人

均 GDP 达到 1.2 万美元后，我国消费需求本应进入 30 年高速增长期后的补偿期，消费率回升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十年我国平均消费率为 54.1%，仅比严重偏低阶段提升 1.9 个百分点，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典型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消费率偏差仍然在 20 个百分点以上。

2. 消费增长率明显偏低

当前消费增长率只有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一半。消费增长率大幅放慢是当前消费不足问题的主要表现，也是当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时消费率依然严重偏低的直接原因。在高速增长时期，我国消费在投资高增长的驱动下也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储蓄率与投资率过高引起的。真正的消费不足问题在 2017 年以后显现，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连续三年巨大冲击后的当前。2000—2016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年增长率都保持在 9% 以上，2017 年以后开始不断下滑，2019 年降至 5.9% 的最低值，同期最终消费的实际年增长率也呈同样的变化。实际消费增长率下降的拐点在 2017 年，到 2019 年两个口径的实际消费增长率都降至 6% 这一偏低水平。与上文估计的未来长期潜在消费增长率相比仍偏低。新冠疫情的爆发使消费增长潜力受到了更大的抑制，两者的结合（前期的“拐点”变化和疫情造成的“伤疤效应”），使得我国当前消费不足问题异常突出。从月度同比增长走势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需求恢复是明显的。前两个月、3 月、4 月、5 月和 6 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3.5%、10.6%、18.4%、12.7% 和 3.1%。疫情连续三年的冲击，引发月度消费同比增长剧烈波动，看实际消费恢复状态或消费不足，必须看四年的月平均增长率，同时与前三年的平均值进行比较。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2%，但如果看四个平均值，这一恢复远达不到预期。两年平均仅为 3.6%，四年平均增长 3.9%，比疫情前三年（2017—2019）平均值 7.7% 低 3.8 个百分点，四年平均的恢复程度为 51.4%（见表 4）。也就是说，如果把疫情前三年的平均值作为现阶段的消费增长潜力的话，那么目前我国消费增长仅恢复了近一半，还有一半没有恢复。将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速恢复到 7% 以上，无论是对解决经济运行面临严重的供大于求、通货紧缩压力增大，还是房地产市场出现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且风险集中释放的问题，抑或是加快建成强大的内需体系以支撑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都是至关重要的。

3. 消费贡献率依然明显偏低

我国消费贡献率变化有规律可循。一是周期波动特征明显。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消费对

表4　疫情前后消费增长的差异

	1–2月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1–6月
疫情前3年（2017-2019）平均	7.7	8.1	7.5	7.4	8.0	7.7
疫情后4年（2020-2023）平均	3.9	4.5	3.4	3.5	4.2	3.9
恢复程度	51.2	55.8	45.0	47.3	50.4	51.4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年月《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相应的投资的贡献率明显上升。相反，在经济周期的调整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而相应的投资贡献率下降，这也说明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明显。二是呈长期阶段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大致经过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8 年至 2010 年，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投资主导。在这期间，消费贡献率的波动很大，主要是按周期的规律波动。其中消费贡献率出现过三次低迷期，贡献率都降至 50% 以下，第一次是 1987—1988 年出现第一次高通货膨胀时，第二次（1989—2002）和第三次（2003—2010）都是由于投资过热。第三次与前两次不同点在于，由于这一时期的重化工业化特征，投资驱动处于最强期，致使投资的贡献率超过了消费的贡献率，这也是导致这一阶段我国消费率严重下滑的根本原因。第二阶段，自 2011 年开始，我国消费的贡献率开始走出“低谷”，但回升缓慢，与需求动能转换的需要相比仍显不足。一方面，消费率上升始终难以达到“常态值”，即恢复到 1978—1990 年间的平均水平。1978—1990 年这 13 年平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6.7%，而 2011—2019 年消费的平均贡献率为 60.1%，相比低了 6.6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从长期看，我国消费的贡献率与消费率会最终趋同，即都达到 80% 左右。也就是说，我国消费贡献率与未来潜力相比，偏低 20 个百分点左右。提升消费贡献率和消费率也就是释放巨大的消费潜能的过程。

（二）巨大的消费潜力被抑制的深层原因

消费“三率”明显偏低的直接原因是居民消费倾向继续下降，未出现实质性“拐点”变化。我国消费率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明显出现一种阶段性“拐点”变化，即在整个高速增长期一路下滑，到 2010 年见底，然后转向回升，呈现一种弱 V 型回升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的回升，到 2015—2019 年间又明显受阻，止步不前。即消费率从 49.3% 回升至 55% 后受阻，在 55%—56% 之间徘徊了 4 年，然后在三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又明显回落；几乎同步，消费的贡献率在达到 2015 年近 20 多年的最高点后也逐步回落。根据笔者的前期研究，其直接原因是居民消费倾向未出现实质性“拐点”变化，从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看均是如此。除去过去三年受疫情冲击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体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最低点出现在 2012 年，为 69.6%，与美国的长期平均值相比偏低约 20 个百分点左右；相对应的边际消费倾向也降至 0.6 左右，偏低 10~15 百分点左右。2013—2016 年间，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出现了回升，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回升的最高点都是 2014 年，分别为 72.2% 和 82.9%。特别是 2017 年后，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再次出现了持续下降，到了 2019 年全体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几乎又回到了 2012 的最低点。加之在三年疫情的强冲击下，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进一步下降。这表明，当前阶段，无论我国经济增长是低是高，在经济总支出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却越来越低，反映在经济增长上则是消费的增速与潜在消费增长率的差距在扩大，这是导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疫情后恢复达不到预期的最直接原因。

居民消费倾向“拐点”迟迟无法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遇到了强的分配端障碍。

第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导致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进而使得当前消费不足问题突出的主因。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或边际消费倾向是高、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的加权平均值。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一般主要是由高收入消费倾向严重偏低引起的。因为收入水平越高，消费倾向就越低。如果在平均收入相对稳定时，收入增长严重偏向

于高收入群体，则因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的明显降低而导致总体平均消费倾向的下滑。由于2013年国家统计局已经没有了五等分的消费支出数据，近十年来五等分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变化情况不明。但还是有一些其他指标可以揭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偏大、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长期无法实现“拐点”变化的根本原因。

一是基尼系数长期偏高。2003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79，属于居民收入差距偏大的水平，2008年基尼系数上升到0.491的最高位，之后尽管有所回落，但始终处于高临界值。二是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偏低。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统计显示，2021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为51.73%，这里劳动者报酬包括个体工商户的收入和非企业股权收益等，因而与世界银行统计不可比，扣除这部分后也只有4成多。因此，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偏低10个百分点以上。三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的占比偏低。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数据，1992年以来，我国初次分配明显在持续向企业部门倾斜，而二次分配则向政府倾斜，居民收入分配占比长期相对不足，且二次分配的直接调节功能明显偏弱。

第二，财富差距显著扩大和严重的房地产泡沫问题等共同作用，对消费增长形成巨大的累积性“挤出效应”，这是导致居民消费倾向难以回升、消费率上升明显受阻的另一个分配端重要原因。许多研究成果显示，我国的财富差距远大于收入分配差距，财富分配差距的扩大通过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来强化资本的地位，提高资本收益率，再加上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必然会导致更大的收入不公问题。诚然，在实体经济发展中，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带来的资本与劳动分配差距的扩大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但来自于财富增长过程的资本食利化而引起的财富与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明显属于严重的收入不公问题。资本食利化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房地产泡沫化问题，对消费的影响分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短期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长期则会对消费产生明显的累积性抑制效应。

研究发现，2015—2018年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GDP增速呈明显的同步放慢趋势，但最终消费支出实际增长则一直保持在8%以上，即实际收入增速持续下降而消费增长却保持稳定。导致这种“逆规律”的原因只有一个，过度的住房支出在对总消费产生明显“挤出效应”的同时，特别是在房价泡沫化严重阶段，又会产生“加强效应”，但最后会累积产生更大的“挤出效应”。消费不足主要反映为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2013—2016年间居民消费倾向的回升，主要是房地产泡沫化加重而产生的“财富效应”，房地产的超强繁荣不仅会直接拉动更多的住房装修或家居消费，而且还因财富增值而增加对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及旅游等服务的消费。这正是在2015—2018年看到的情况，住房市场的超强繁荣对平均消费倾向及消费率的严重偏低形成一种短期“上拉效应”，即最终消费支出实际增速持续4年比全体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高1.1~2.1个百分点，但当房地产繁荣结束后，便形成更大的下降力，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再次明显下降。

房地产泡沫对消费所形成的累积性“挤出效应”，还可以做更深入也更有说服力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越发达的地区，边际消费倾向越低，从国际比较来讲，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至少我国的发达地区在近阶段不应该出现这一现象。在2017—2019年间，我国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的地区都是在发达地区或比较发达地区，在这期间，平均边际消费倾向降到0.5以下的有4个，分别是北京（0.50）、江苏（0.49）、辽宁（0.41）和内蒙古（0.42），而2014—2016年间则无。在发达地区中，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是广东、福

建和浙江，2017—2019年间平均值分别为0.62、0.63、0.57，但这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也是偏低的。也就是说，主要发达地区，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化对当地消费增长已形成了较强的累积性“挤出效应”，许多年轻人买房过多地透支了收入和储蓄，导致消费能力的明显下降。

第三，就业结构问题也是导致居民消费倾向迟迟难以止跌回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决定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高低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就业升级，在社会处于较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就业高端化以及高端就业占比的不断提高明显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与比重，从而促进收入的均等化，进而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总量就业压力明显缓和，但结构性就业问题异常突出，主要是大学生失业率问题异常突出。如疫情爆发前我国的大学生失业率就接近10%，受疫情三年的冲击，大学生失业率不断上升，今年4月份以来连续突破20%。大学生的高失业率不仅意味着大量人力资本未充分有效利用，造成资源浪费与经济效率的损失，而且从国民经济循环角度看，则形成了明显的来自生产端的分配障碍，即生产活动创造不了足够多的高端就业岗位，从而明显抑制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从生产端与分配端的矛盾看，生产结构在不断高端化，而就业结构却呈现低端化，在经济结构上的表现就是就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这是导致大学生失业率过高的根本原因。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六大高端制造业和三大高端服务业过去9年就业增长缓慢，占比呈下降态势。特别是六大高端制造业就业9年间减少了157.37万人，引人注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高端就业岗位的严重不足，主要是由于高端产业链条太短，如我国重要的产业链在研发环节普遍存在就业规模过小、分散等问题，同时，相关联的高端服务业发展也明显不足。2011—2020年间，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三类就业技术含量不高的服务业，其就业增量贡献大、占比上升快。2011年这三类产业单位就业总数为1040.49万人，到2020年则猛升至2027.97万人，增加了近1倍，相应地，就业占比由7.22%上升到11.90%，9年间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了37.61%。最近两年房地产调整趋势的形成，则使就业“双端受压”。

第四，当前居民消费的严重不足还与消费环境不完善有较大的关系，即不敢消费和不愿消费。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加快转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加快建设，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对消费的稳定增长起了一定的支撑作用。但由于总体保障水平还不高，且城乡保障水平的差距明显偏大，特别是面临“三高问题”（房价高、就医成本高、教育成本高等），使人们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稳定性都显著提高的情况下仍然“不敢消费”。这也是居民消费倾向长期偏低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通过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来扩大消费，还要从完善重要的二次分配机制即加强民生保障这一重要环节入手，这实际也是分配端的解决方案。

另外，现阶段我国消费不足问题的产生也与消费的“软硬”环境建设滞后有较大的关系，如果总体消费环境不好，便会出现“不愿消费”问题。从硬环境来讲，通常比较重视建设与生产配套的公共设施，而比较忽视建设与消费配套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多交给民营企业，而政府在规划和建设上多处于“被动状态”，从而导致居民生活配套设施供给相对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的时空便利化水平明显偏低。另外，解决消费“愿不愿”的问题，还有许多“软环境”建设的“课”要补，主要是社会信用水平长期偏低。如今年“五一”期间，消费热闹而消

费水平却在降级，这与旅游业相关的环节乱涨价（不少酒店住宿价格翻了几倍）有关。同时，在商家的产品、服务及各类投资活动中，假冒伪劣现象也比较严重。

总之，消费不足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分配端的问题。解决消费问题，必须从分配端入手，下决心着力深化分配改革是“大关键”。

三、扩大消费的根本之策是深化分配端改革

（一）扩大消费需要新思路和新的政策框架

要解决认识问题，在战略上和政策上都要突出扩大消费的关键作用。从新发展阶段的长期动力变化看，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作用不同。消费是稳增长的关键，在新的大国竞争环境中，特别是要始终在中美长期战略竞争中保持主动权，必须依靠强大的内需这一最重要的资源，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战略作用。即消费对我国经济由大变强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方面，同时还对有效化解美国对我国的长期战略遏制政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消费强，国家才能真正的强，消费强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居民生活水平高，另一方面则对强大产业竞争力的形成起重要支撑作用。

所以，笔者建议在强国建设中要加上消费强国建设，同时，要提高消费的战略功能定位，将消费对经济的作用由“基础作用”提升为“主导作用”。同时，要认识到消费不足问题的长期化，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障碍与风险，稳增长不是“救房市、救股市、救汇市”的问题，而是从短期和长期都要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扩大消费上，彻底改变依赖投资、依赖房地产来稳增长的传统政策思路。也因此，对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的认识，不能将其理解为短期的权宜之计，而应该理解为我国宏观调控重点的长期深远变化。

扩大消费必须从国民经济循环整体的重要链环中找到突破口，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正是这一关键突破口。当前我国消费不足问题的显现，实则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目前的消费不足问题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消费、生产—收入分配两个子循环不畅，其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分配制度存在严重不公以及产业高端化发展模式不合理等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向上回升的“拐点”无法形成。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才能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促进居民消费倾向显著回升，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问题。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的过程，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

当务之急是要认清“分好蛋糕比做蛋糕更重要也更紧迫”，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关键时刻。当前，分配激励机制明显衰减、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和分配不公对整体发展激励形成强大的负反馈阻力，导致总激励机制衰减，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抑制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的主要障碍。深化分配体制改革、优化分配结构是绕不过、躲不过的“坎”，要高度重视、敢于碰硬。且要深刻认识到，现阶段如果不着力深化分配体制改革，许多发展问题及制度现代化问题都无法解决。要认识到分配差距扩大之后会自动缩小的所谓“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实践上总是难以成立的，实际上没有强有力的外力干预，收入分配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收敛。

就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来讲，在稳增长中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至关重要。在常态发展期，“消费不足投资补”的思路和政策惯性，只能使消费不足问题“治标不治本”，巨大的消费潜力依然会被明显压抑，并可能出现消费不足问题的累积性扩大，进而加剧宏观经济供需失衡。在危

机状态下，为了抵消外部冲击的过大影响，采取“消费不足投资补”的办法，是“救急”和争取时间的有效办法。投资确实有增加就业和增加消费的效应，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资本高能化发展，这种效应呈长期的递减性。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般性投资所产生的产能扩张效应会明显大于收入和消费的增加效应，结果不仅会延缓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动能切换，而且会造成更大的供大于求问题。而通过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不仅会产生更大的总激励效应，而且能显著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有效化解各种经济失衡问题。因此，在短期稳增长中，要着力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建议实施以深化分配体制改革为主的一揽子扩大消费的方案

尽快制定和实施“一增一减”的税制结构改革。扩大消费关键的是要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提高消费率。改革的重点就是深化二次分配改革，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缩小居民收入与财富差距，降低总体储蓄率。深化二次分配改革，就是要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完善两规范”要求，提高直接税比重，强化税制的累进性，建立公平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制度。这就是所谓的“一增”。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其“工薪税”的特征，使其能够覆盖所有的高收入人群，达到调节高收入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加快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的立法，合理设计和实施房地产税、遗产税方案，坚决抑制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

当前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将会对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两大积极效应，一是可以产生巨大的消费促进效应，即通过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和增加二次分配能力来促进消费增长；二是激发企业的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即将增加的税收用于给企业“减税”——永久性的大幅降低间接税税负，从而促进企业效益改善和生产率提高。消费促进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明显增加高收入群体的税负，可直接降低社会总储蓄率，明显增加公共福利资金，促进消费率的提高和居民消费倾向的明显回升；二是增加地方财源，逐步代替地方“土地财政”，从而减少对投资与房地产的依赖，进而通过降低投资率来提高消费率。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为另一边实施“减税”改革提供重要条件，增加直接税可以优化税制结构，降低或取消间接税同样可以优化税制结构。特别重要的是，实施“一增一减”的税制改革，在有效调节一次分配差距过大、增强二次分配功能的同时，还可以明显提高一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性。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减少低效投资，提高资本要素效能，逐步降低投资率，增加可用于扩大消费的资源或能力。导致我国投资率过高、消费率明显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的效能偏低，反映为投资效果系数严重偏低，目前仅为 2.3，而发达国家平均在 5 左右。高效的投资和高能的资本是提高消费购买力的重要条件。如投资效率的提高，可以降低企业的积累率，增加职工工资。优化国民经济的支出结构，也是分配改革，重在提高生产与投资效率，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消费。

首先，当务之急是减少生产过剩行业的投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就工业来讲，我国绝大多数工业品产量已经过了产品生命周期的峰值，继续增加一般性的投资只会导致更大的生产过剩、物价下跌。政府与行业协会要从立法、政策及大数据信息等方面来引导企业减投资去产能，优化投资结构，把企业投资发展的重点集中在盘活存量资本、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上。

其次，处置僵尸企业是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的一个重点，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点——解决存量资本“堵塞”

问题。处置僵尸企业要与化解当前金融债务风险有机结合，系统设计、综合施策。中央政府设立跨部门领导小组，并成立专门的处置机构，制定包括欠税及滞纳金豁免、“僵尸企业”不良贷款专门核销和独立考核、统借统还债务拆分处置、设立职工安置救助金等一揽子的激励政策。对于产能落后、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僵尸企业，应当机立断停止“输血”，将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向新兴产业和创新领域。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功能，使人们减少后顾之忧敢消费。完善和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的稳定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显著提高人们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促进居民消费倾向上升。要积极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特别是要大幅度地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加快推动基本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要着力完善基本养老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同时，要加快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完善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制度，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

做深做实高端产业链，提高高端产业就业比重，是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消费能力的重要途径。一是推进产业智能化、低碳化、融合化，在重要产业链加快实施延链、补链、升链、建新链等四链工程，提高高端、高水平就业的专业化和纵向一体化水平，在解决许多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同时，创造更多的高端就业岗位，从而有力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二是要发挥新技术、新模式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传统产业明显提升就业质量。既要鼓励数字化技术和工具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又要促进新型就业业态的快速发展。三是在产业升级和就业结构升级上，要做足“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增加就业机会，重在不断完善创业创新发展环境，打通教育、科技、人才与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联，使就业高级化与教育、科技等发展实现深度交融、相互促进。特别是要着力建立有利于全面创新的基础性制度，使教育、科技、人才与创新有机结合，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促进机制，使就业在深度融合中不断高级化和充分化。

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重点是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做到既减负又提质，既提高居民公共消费支出水平，又增加公共消费外的其他消费能力。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就是要让各类公共服务质量结构优化，增加“良”的比重，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合理结构。即要着力改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以“扩中提质”来增加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同时，建立合理的收费机制，以提高公共服务“性价比”来增加可及性。在教育上，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强化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促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在医疗上，要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在住房上，要促进住房价格理性回归，重点是大幅降低大城市中年轻人购房和租房负担，提高住房质量。在就业上，要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加强就业培训与公共服务，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优化消费环境，提高居民消费“时空便利化”水平。首先，要做好长期性的城市更新规划，加强生活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把振兴街道经济放

在城市更新规划的核心地位。要在规整规范街道景观的基础上着力提高街道服务功能的多样化，提高集聚效率。科学编制商业网点规划，严格社区商业网点用途监管，鼓励增加24小时便利店及各种便民店，对其采取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和租房补贴政策。其次，要从长计议、下大气力解决街道停车问题，使城市街道更有利于步行、休闲。建议通过旧城改造、城市空间优化，有计划大量建设停车楼、停车场，着力解决街道乱停车问题。再次，制定保护传统商业特别是小商业的法律法规，扩大中小商业的生存空间。对书店、小型公益性博物馆等文化服务业发展提供租房补贴。对街道摊贩实行更为宽松开放的政策。最后，大力发展具有各地文化特色和创新创意内涵丰富的“夜经济”及其他消费新模式，建设更多的规模适中的具有综合消费休闲娱乐功能的主题文化生活广场。

[参考文献]

[1]罗伯特·M·索洛.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M].英国:牛津大学克拉伦顿出版社,1970.
[2]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 习近平李强作重要讲话[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2-12/16/content_5732408.htm.
[4]王小广,张宴玮,梁雅楠.2023年我国宏观经济趋势及政策建议[J].企业管理,2023(1):13-18.

责任编辑：刘学侠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Expanding Consumption at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ang Xiaoguang & Liang Yanan & Zhang Yanwei

[**Abstract**] Consump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a market economy. At present, the main problem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serious shortage of consumer demand. We need to view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expanding consumption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cycle and changes in growth dynamics, and prioritize the restoration and expansion of consumption, not as a stopgap measure, but as a key initiative to stabilize growth in the long term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panding consumption must focus on the national economic cycle as a whole, and solve the key "blocking poin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bottleneck.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is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lower the savings rate and increase the consumption rate, and promote a significant rebound in the propensity of residents to consume, so that the huge consumption potential can be effectively brought into play, and provide strong demand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 is proposed to implement a package of measures to expand consumption mainly b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To make it clear, we should make the reform of the tax structure, perfect the fun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makethe high-end industrial chain solid, optimize th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so as to highlight the key role of expanding consumption both strategically and policy-wise.

[**Key Words**] National Economic Cycle; Shortage of Consumer Demand; Propensity to Consume of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side Reform